

# 呈现“人”的主体性： 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附近”

黄思奕 严 飞

**摘 要** 如何呈现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是社会学方法论中的重要议题，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却常常被忽略和捏造。通过回顾西方和中国语境中以普通人为对象的经典研究，可梳理再思考在研究中呈现其主体性的方法。首先，研究者应当反思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正视研究对象被遮蔽的主体性。其次，研究者应当为研究对象创造自主表达的空间，呈现日常深处普通人的行动逻辑，力图在分析中将“琐碎”的日常生活再现为一种“结构”。最后，研究者通过“成为他们”以及“本就是他们”的方法，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历史两个维度拓展“附近”的概念。“附近”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场域，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学人本主义意涵上的一种价值判断。研究者通过“附近”的个案映照出社会整体的图景，并与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共同抵达社会学的关怀。

**关键词** 主体性 “附近” 日常生活 社会学

作者黄思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5-0138-10

## 一、知识即权力：正视主体性的存在与来源

“主体性”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话题。它既涉及方法论上的反思，探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又涉及研究价值的判断，即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当发挥的人文意涵。在过往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完整地发掘和呈现研究对象在特定社会场景和社会事件中的行为及其实践逻辑，归纳研究对象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与流变，避免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或理论视角组织研究材料，以呈现和肯定研究对象的主体性。<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主体性的关注和反思往往聚焦于社会的相对弱势群体，乃至底层群体。这是由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天然存在着“观看—被观看”的关系，研究者往往更容易“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sup>②</sup>，有选择性地以自身结构性的道德或理论框架来解释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研究者又往往总是处在社会的相对优势地位，而社会弱势或底层群体又总是更难发出声音。但这是否意味着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一定要经一个实质外来者的“呈现”来被认知和确认？研究者在写作中又首先应当如何认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关乎研究者是作为操纵知识的中介人，还是沟通个体与社会的桥梁。

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研究者、读者的身份定位常常被悬置，从而使得研究者在故事中以隐没的方式呈

① 田鹏：《主体性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姜佳将：《流动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的妇女意识与实践》，《浙江学刊》2018年第6期；严飞：《“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②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现自己的“主体”，使读者不自觉地进入研究者的视角，进而将研究对象的个体故事识别为社会结构性的集体故事。当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被研究者和读者的眼光淹没，他们在文本中只能以客体的形式出现，且被悬置取消了成为主体的可能。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无名者的生活》中，描绘了自己所编写的那些在历史档案和法律文书中“一闪而过”的“故事（nouvelle）”，以及他对权力话语和无名者日常生活的看法。这种讨论和历史学界中平民史对精英史的批判和超越看起来颇有相似，但福柯的观点显然与众不同，或者说更进一步探讨了在历史中普通人的主体性问题：

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不过，我们要想有机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也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权力埋伏在那里，守候着这些生命，监视着它们，追踪它们，权力也会关注它们的抱怨和小打小闹，哪怕只是偶尔；权力的爪牙还会袭击它们，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权力的烙印。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或是因为有人自己向权力呈言，用这些文字来告发、申诉、恳请或哀求；或是因为权力想要干预，然后用寥寥数语来裁决或者宣判。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象（像）谜一样。……那些生命正在那里谈论着自身，为什么你不去听听……生命最热烈的点，能量积聚的地方，恰恰就是它们与权力冲撞的地方，与权力斗争，努力利用权力的力量，或者力图逃避权力的陷阱。<sup>①</sup>

在福柯看来，当这些社会的无名者和权力相遇时，他们的只言片语才能被记录。他的使命是把这些零散的只言片语努力组合起来，构建一幅宏大历史和权力体系之下底层世界的图景，并在其中“重新发现像这样闪耀着光芒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超越了前人有关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之争、精英或者底层视角之争的观点。主流学界总以为这些“普通人”和“无名者”的主体性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才能被呈现，在历史研究中就要采取一些非官方的民间文本和记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就要进入底层生活与文化，理解和解释普通人对自己行动和思想的阐释。但福柯告诉我们，即使是在主流历史的记叙里，在国家权力的话语里，在人们以为社会的相对弱势群体最无法发出声音或者声音被篡改的地方，仍然有普通人的主体性发挥作用的空间。这才是普通人拥有主体性的最好例证。

当然，这种观点的产生，源于福柯认为权力是弥散而无处不在的，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权力无法企及普通人的内部。但他对“人”的主体性的看法并不是悲观的：“一个社会将各种言辞、语句和构思起承转合的顺序以及语言的仪式‘借贷’给那些无名的大众，以便让他们能够讲述他们自己，而且是公开地讲述他们自己。”<sup>②</sup> 换言之，权力虽然是为了精英的统治而制造知识，但知识在被运用于权力控制的过程中被人们习得并灵活改造，新的民间知识由此在其中生发，继而成为无名者对抗统治精英的最好武器。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更加明确地描述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sup>③</sup>

在福柯所描绘的现代世界里，社会吞噬自我，灵魂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的创造物，知识成为权力控制和审判个体的手段，但或许救赎灵魂的办法就隐藏在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之中。如果说在严密的纪律规训之下，作为个体的人还有什么能与权力对抗的，那么一定是在表面服从规训机构的要求之下，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和不被人发现的“越轨”行为。<sup>④</sup> 每个人的个体知识就像一座冰山，它能够被挖掘的永远只有很小的、

①② 米歇尔·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王倪校，《社会理论论坛》1999年第6期。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9—30页。

④ Erving Goffman, “The Underlife of a Public Institution: A Study of Ways of Making Out in a Mental Hospital,” in *Asylum: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1961, pp. 171–320.

结构性的一部分，而在水面之下的、不被权力所看到的正是个人主体性的来源。事实上，“前台”的世界有多驯顺和有用，就一定需要“后台”的世界更加复杂和庞大，个体被权力愈发规训的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主体性的尚存——否则，人早已成为行尸走肉。

虽然权力发明和制造了知识，并用这套知识规训个体，但个体也不断地在隐秘的私人空间中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认识和使用知识。读者从表面上读福柯，的确更容易关注到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有多可怕，但同时他也引导着我们读罢之后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反思自我。也许在不断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找到抵御权力渗透的办法，或者至少找到不被完全吞噬的办法。

福柯给予我们的是间接经验，事实上个体也有用直接经验重新认识权力和知识的能力。当权力对个体灵魂的压制到达极限，人们就会回到社会去寻求更多相似的个体，个体的灵魂也就不再孤立、封闭。近来对“内卷”和“躺平”问题的大讨论，对“加班文化”“过劳时代”是资本谎言还是个人奋斗的辩论，对“加速时代”里如何“慢”下来的探索和思考，对“健康码”“摄像头”里的个人隐私和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的两难争论等，这些问题不仅被学者讨论，更是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毫无疑问都会出于个体自我的切身经验，去辨别和重新审视那些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进而在这种思辨中重新定位个体在社会里的关系，发现专属自己的、能让个体灵魂自由、神圣的时间和空间。

所谓的“个体知识”和“权力”的分野，与张小军所说的“文化”与“政治”的分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sup>①</sup>很多大的社会事件似乎在国家历史和权力话语里举足轻重，但在普通人的视角里，似乎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比如渡江战役中“送亲人过江的大辫子姑娘”，在新华社记者的镜头和所写的报道里，她是广大自发支援解放军的群众里最有典型性的代表，是“民心所向”的最好例证，这是一种国家的、政治的、权力的逻辑。但对于这位“大辫子姑娘”自己来说，“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从前就是跑船生意的，在水上来来去去……还没解放时，在江面做生意的船家时常有被国民党抢夺的事情发生，‘送亲人过江’，是他们那代人为了生计，为了不受人欺负而做出的选择”<sup>②</sup>。这是一种地方的、文化的、底层的逻辑，并且这两种逻辑总是并行在运转。

这个例子也印证了普通人只有在和权力相遇的刹那，他们自己的话语和主体性才能被保存下来，尽管只是在国家和权力话语的掩映下。“在苏北老家，许多人家都曾亲历过那段战事。举家搬迁到江南后，有的邻居对这段传奇往事并不相信。‘如果当初没有看到电视上的照片寻人，可能这件事就不能证实了。’”所以不管是官方历史的话语，还是学术研究的叙事，或是民间自己的描绘，普通人总能够在其中发出或强或弱的声音。学者们所纠结的，是站在研究群体之内还是之外、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地“观看”，但对于无名者们来说，这些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始终有自己的意识和文化，不论在研究者看来是破碎的还是完整的；他们也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行动逻辑，不论在研究者看来是分散的还是统一的。

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或许应该首先正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不应天然地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的代言人，不应认为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只能靠研究者的建构才能生成。研究者应当认识到，普通人自己就能够发出声音，也能对自己的生命历史作出陈述和反思，他们缺乏的只是一个关注的目光、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不论研究者们多么尊重和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与逻辑，试图去“帮助”底层呈现和表述，远不如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更能完整呈现研究对象作为“人”的主体性。即便是普通人的生活也从不缺乏故事，更不缺乏会讲故事的人，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讲述的通道，使研究对象能够且愿意讲出他们自己的历史。

但与此同时也应当明确，主体性不是“天生的”，人的主体性意味着在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不断的归纳、反思和行动（这也正是社会学所关注的部分）。正如福柯所言：“主体性不与本初或是基本的体验相联系，主体性不与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学相联系。主体性被构想成在主体和自身真相的关系中自我建构与自我

① 张小军：《让“社会”有“文化”：人类学自我本土化反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81—182页。

② 戴竺芯：《摇橹送军渡江的“大辫子姑娘”还好吗？她已92岁高龄》，《封面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859992475987402&wfr=spider&for=pc>，2021年1月25日。

转变。”<sup>①</sup> 因此，主体性需要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表达、呈现和阐释时才能够成立，不论是否公之于众。这也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去呈现这种主体性时，应当如何操作？换言之，研究者应该如何更好地提供一个让研究对象“讲故事”的平台？

## 二、琐碎即结构：从日常生活里建构历史

在《倾听底层》一书中，郭于华把口述历史和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明确研究者不应该“代替”或者“制造”研究对象的历史，而是“倾听”和“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为底层拓宽表达自己的平台，研究者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叙事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归纳：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而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种穿针引线，通过口述历史的重构把那些以往发不出声音的人们的声音传达出来。就此意义而言，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阙。口述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歷史评判。<sup>②</sup>

相比传统史学对历史纯粹忠实的记录，郭于华把社会学田野工作再往前推了一步，希望社会学研究者“除了将这‘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就此而言，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这种建构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建构，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建构，是不违背常识常理的建构”。<sup>③</sup>

从这一段话中，研究者应当体会到以下三层涵义。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制造”与“构建”历史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前文不断提到的要为研究对象创造讲述的空间。他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以及他们对其的评判，而非研究者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剪辑和评价，这才是支撑社会学研究的材料。

其次，普通人的“主体性”就是人们面对结构困境和权力束缚仍能过好自己生活所采取的行动和运用的逻辑。在海默尔（Ben Highmore）眼中，日常正是呈现这样一个动态过程的空间，“使不熟悉的事物变熟悉，对习俗的溃决习以为常，努力抗争以把新事物整合进来，调整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日常就是这个过程成功或挫败的足迹”<sup>④</sup>。换言之，日常生活才是研究对象发挥主体性的场域，所谓研究者构建的“历史”，以及那些结合某些社会理论串起散碎材料做出的分析和表达，也都出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不过常常被研究者们所忽略。

再次，研究者应当意识到自己除了记录日常之外，表达和分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也是研究者存在于读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意义。这一点防止了研究者把自己与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完全割裂开来，以撇清作为写作者的角色义务。这是因为日常生活的“体验（erlebnis）”与“经验（erfahrung）”并不等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现代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起来愈发丰富，有大量令人炫目和震惊的“体验”，这种体验是身临其境过的经历，因为不能被反思和批评，从而变得沉默和琐碎，不可能被融入到生活的意义中。但“经验”是可以被收集、积累、反思和交往的知识，在社会层面上是有意义的。<sup>⑤</sup> 对研究对象来说，体验是天然存在且丰富多样的，因此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对体验中沉默的日常生活进行挖掘，从而能被人们认识、批判和改变，变成一种经验。

同时，研究者的目标也不应该是猎奇，以挖掘出尚未被当事人意识到、被外人认识到、或是被学界关注到的理论，而是在复杂社会的若干可能性中，结合经验寻求分岔回路，从而呈现出更清晰的生活世界。叶启政在论述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时也有类似的表达：“社会学的诠释不是使隐者显或浊者清，而是创造更丰富的谜语（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感到惊艳不已。……与其说社会学家是一个‘未预期结果’事实的挖掘者，不如说是编织‘理念型’故事的艺匠人。”<sup>⑥</sup>

① 米歇尔·福柯：《主体性与真相》，张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16页。

②③ 郭于华：《倾听底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8页。

④ 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页。

⑤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Harry Zohn (trans.), London: Fontana, 1982, p. 133.

⑥ 叶启政：《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社会》2016年第2期。

在主流学界，日常生活常常被研究者们当作一个“剩余范畴 (residual category)”<sup>①</sup>，更多作为一种“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构成一天又一天的行为，并不对他们作出判断，和我们最为切近的风景，随时可以触摸和遭遇的世界）”来理解<sup>②</sup>，似乎“日常”是与理性的、宏大的“事件”完全对立的事物，而相较起来后者才是研究者们拿手的研究范畴。但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长期以“结构”为核心范式而导致的在主体性表达方面的局限。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事件”固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节点，但“日常”才是占据了大部分时空的状态。同时，权力总是更关心“事件”，企图在关键的节点上遮蔽细节、统一声音，这也使日常生活相比之下为普通人的主体性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对比东西方有关日常生活与主体性之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传承与延续，但更多的是显著的差异。日常生活理论的集大成者应数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他对日常生活的发现、解读和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观。他认为虽然日常“有别于那些杰出、高级、专业与系统的行为”<sup>③</sup>，但它与这些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包含它们的差异与冲突，是它们的纽带和共同基础，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类整体意义的联系才得以形成。这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普通人看似琐碎的日常正蕴含着联系“整体”、形塑“结构”的力量。

进一步来说，日常自身就蕴藏着创造新的日常的力量。德·塞托 (Michel de Certeau) 提出了日常实践中的“战术 (tactics)”<sup>④</sup>，认为虽然当下的过度现代化殖民了日常生活，但抵制的事实一直存在，各种合情合理的差异性实践还有一席之地。人们“带着一种甜蜜的固执去抵制盲从因袭的蔓延，加强各种交流与关系组成的网络，学习如何在工业时代所生产的各种工具和商品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攫夺住位于我们自己的某一部分之上的权力”<sup>⑤</sup>。这意味着尽管普通人相对于权力主体来说是弱者，但随着不断地抓住“机遇”，通过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将不同的要素向着有利的方向组合到一起，就有可能实现“战术”的胜利，抵抗住企图改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这也正是普通人主体性的展现。在具体操作层面，德·塞托认为要标明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压制，要拯救各种稍纵即逝的踪迹，要发展符号学、语言书写之外的听觉、触觉、嗅觉等方面所呈现的日常；本雅明则认为电影中的慢动作和特写镜头是挖掘日常生活的绝佳工具。<sup>⑥</sup>

而在国内，近年来使用口述史、非虚构写作等方法关注日常生活也逐渐得到关注。<sup>⑦</sup> 中国社会学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并不是突然萌发的，以谢立中、杨善华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一直倡导用“现象学社会学”的方法洞察日常生活。<sup>⑧</sup> 他们认为把日常生活作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目标是探究生活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意涵并理解这种意涵（比如人的行动意义、各种文本背后的意义）。而通过“现象学社会学”的方法有可能获得一种独特的对生活的穿透力，可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背后的生动性，并将这样的意涵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联系。

在具体的现实关切上，出于对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关注，乡村成为中国学界早期主要的日常生活研究田野。受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节奏远远落后于城市，留存下诸多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习俗和惯例。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遭遇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本土的文化惯习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导致日常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剧烈变动。改革开放以后，旧有的地方文化风俗又被报复性地重拾和回归。这种发生在乡村的巨大社会震荡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通过透视乡村日常生活在宏大历史叙事下的变迁，能够以小见大，解释历史情境对个人、集体、社会的影响。最典型的案例是对“过日子”的相关研究。所谓“过日子”，按照吴飞的说法，是中国人最为普通的生命历程，

① 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5, p. 55.

②⑥ 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第4、115页。

③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1*, John Moore (trans.), London: Verso, 1991, p. 97.

④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9页。

⑤ Michel de Certeau, Luce Giard and Pierre Mayo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Living and Cooking*, Timothy J. Tomasik (trans.), Minnesota,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 213.

⑦ 2022年底，《探索与争鸣》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了“中国叙事：非虚构写作与当代社会变迁”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2023年，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举办了首届“魁阁”社会学人类学写作工作坊，关注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意涵。

⑧ 参见杨善华：《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页；谢立中：《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包括“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sup>①</sup>，也是中国普通农民在家庭中处理人、财产、礼仪三方关系的权力博弈，这一概念框架是社会学考察农村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例如，陈辉在《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一书中详细描绘了黄炎村的几个爱情和婚姻故事，涉及介绍对象、再婚、性别关系等，在婚姻的日常生活中作者企图揭示出农村家庭内部的权力争夺和伦理秩序的变化。<sup>②</sup>而近年来，对农村日常生活的研究也多是透过农民的日常生活企图促进对国家宏观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解读。<sup>③</sup>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大都会为代表的城市日常生活模式也在不断变化，国内日常生活研究视野的重点逐步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集体记忆被宏大叙事所侵蚀和改造，继而导致日常社会网络结构愈发松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愈发陌生。目前国内的城市日常生活研究，主要借鉴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框架，分析特定空间中城市的日常生活实践。城市的空间有很多表现形式，比如街区、公园、购物广场这种“活的”空间，或者是地图、规划文件、出版物或其他文化形式中对城市空间的再现空间。<sup>④</sup>这其中，社区是受到较多关注的城市空间单位。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空间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抓手。但同时，城市日常生活研究又往往缺乏了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的思考，可能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动与背后的社会情境失去准确的定位，因此也有学者希望从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度进入日常生活的动态研究。<sup>⑤</sup>

纵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乡村—城市、时间—空间的叠加框架下，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构建出更为宏观的社会图景并作出理论解释，并展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是拥有一种“向下”的目光，把日常生活与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联系起来，通过具体的个案锚定对“大众”生活世界的关注，而非群体中的少数或是精英。其二是把日常生活与一种行动主体的“在场”、文化与知识的“在地”联系起来。其三是倾向于把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社会结构对人的规训看作对抗的双方，或者把日常生活看作是普通人与权力的主体性斗争空间。

这些特点既有与西方相似之处，亦有所差异。这源于西方日常生活理论是建构在发达工业社会基础上的批判，批判日常生活的“殖民化”问题，寻求日常生活的本初意义。中国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则是由于传统与现代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冲突，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以及日常生活中私人性与社会性共存的矛盾。中国学者的关注旨在寻找并维护普通人在强大结构性力量下的日常生活空间，为社会共同体的延续找到可能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看似琐碎的“剩余”，为何值得被以“结构”分析为学科本位的社会学所关注，并且为何这是呈现研究对象主体性的更好方式。

不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对抗还是驯顺于结构和权力，抑或动态地游走在二者之间，我们总能从琐碎的日常中看到社会结构的作用，看到人们在其中的位置及其反应，这才是凸显社会学人本主义内涵所应该做的：不仅只看到“结构”，更要看到“结构中的人”。事实上，我们也只有通过发掘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才能真正把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联结起来，看到那些看似偶然的个人选择和命运背后诸如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教育再生产等要素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不仅应当作为研究背景，还应重新赋予“日常生活”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将其作为破解传统底层叙述背后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呈现普通人处理与权力关系的主体性的重要工具。

### 三、个人即社会：“附近”作为一种价值判断

日常生活似乎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却时常看不见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其原因之一是处于数字时代，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和数字技术带来的远端世界，忽略了投身于真实生活中身边的“社群”。当社交媒体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路径依赖，一种基于具身体验的灵韵，似乎正在凋零。其二是加速悬浮的

① 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② 陈辉：《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0—60页。

③ 参见张有春、杜婷婷：《两种真实的交织碰撞——一个西南贫困地区民族村落的田野与日常》，《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5期；仇凤仙：《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④ Mark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Lagopoulo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

⑤ 赖立里、张慧：《如何触碰生活的质感——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论的四个面向》，《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

组织肌体衍化出所谓的“离散社会”，尤其在城市中人与人的“陌生”状态，使我们习惯于不是根据对这个特定的人的了解来打交道，而是根据对方作为一个更一般的共同体的一员所具有的普遍性质。其三是社会学的结构视角常常在宏大叙事下将个体情感、日常经验等放置于研究视野的边缘位置，或将其作为大叙事的零部件。

因此，普通人如果始终被视为“他者”，他们就会“如同一片没有裂痕没有缝补的织布，如同众多被量化的英雄，在转变成不属于任何人的细胞与理性的、变幻不定的语言时失去自己的名字与面孔，成为街道上那一条条被标上了数字的河流”<sup>①</sup>。那么研究者即便看似研究日常生活，也无法真正理解研究对象所身处的生活世界的逻辑，离呈现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也就相去甚远。

那么，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观察容易陷入“视而不见”的情况下，如何践行呈现主体性呢？正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每一种文化都是“地方的”<sup>②</sup>，只有当地人最了解当地的情况，要真正呈现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我们必须进入他们所在的“社会小世界（social microcosms）”，把“他者”变为“我者”。

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又一个场域，“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布尔迪厄明确指出，对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to think in terms of field is to think relationally）。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而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漫无边际的抽象社会中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社会小世界的联结，社会的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同行动者得以相互联结起来，并构成一个动态的过程。<sup>③</sup>

布尔迪厄的“社会小世界”这一定义与项飙所说的“附近”相呼应。“附近”作为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常态下平凡相遇的生活空间（a lived space），其本质是人与人产生情感和意义联结的关系场。<sup>④</sup>作为外来的研究者，只有进入研究对象的关系场，才能成为他们生活空间中的一部分，才能找到自己应该呈现的、真实的主体性。<sup>⑤</sup>

这其中，研究者围绕某些特定的职业或阶层，或采用一种“成为他们”或“本就是他们”的扎根方法，可以更深入地进入熟人社会，挖掘深层日常。

第一，“成为他们”是把原本相距遥远的研究对象群体变成研究者的“附近”。比如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所著的两本书《我在底层的生活》和《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都是采用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去体验美国蓝领阶层（working poor）和中产白领们的工作和生活现状，深刻揭示出美国经济衰退浪潮下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中、下阶层生活不断下沉的状况。<sup>⑥</sup>她的亲身经历和周围人的日常，让读者看到不仅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收银员等面临着透支身体、入不敷出、向上流动无望的现实，那些管理、销售、公关等缺乏一套透明化评价机制来评鉴工作表现的白领岗位，也可能随时离你而去，白领们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失业和瞬间堕入底层的风险。

“成为他们”这一田野方法一直以来都被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广泛采用，民族志写作往往也依赖类似艾伦瑞克所做的“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尤其在研究对象群体边界明晰、内部封闭的情况下，研究者往往面临着更大的抵触和敌意。如果不“成为他们”，甚至连进入田野调查的门槛都很难跨越。例如，徐宗阳对华北地区某农场周边村庄的农民大规模偷采农场玉米这一现象做分析时，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实际并不合法的行为背后农民的观念基础和行动逻辑，在政府介绍和学生身份都没能帮助他获得在地信任的情况下，作为“外来者”的他主动成为研究对象生活中钓鱼或打牌的朋友、家在附近的晚辈、我们圈子里的“自己人”。换言之，只有“成为他们”，才能真正倾听到他们的真实心声：

笔者不再向农民直接提问，而是借由农民的一些休闲活动，比如钓鱼、打牌等，尽量融入农民的生活。当

①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第51页。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③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97.

④ Biao Xiang, “The Nearby: A Scope of See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vol. 8, no. 2&3, 2021.

⑤ 严飞：《以“附近”为方法：重识我们的世界》，《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

⑥ 参见芭芭拉·艾伦瑞克：《我在底层的生活》，林家瑄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芭芭拉·艾伦瑞克：《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林淑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农民会对笔者的身份产生疑问。笔者的选择是尽量抹去身份……而是表达为“当地人”“家就是这一片儿的”等。在多次参与当地农民的活动之后，有些农民会邀请笔者去他们家吃饭，接着这些社会活动，笔者进入这些农民的生活之中……笔者所做的几乎所有访谈都是围绕农民的生活本身展开的，而笔者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涉及农民内心看法的问题，都是在参与数次社会活动之后才开始谈起。<sup>①</sup>

在这样的研究中，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对于被访者的可解释作用的知与行的主要特点，采访者有近乎全面的了解，而且由于熟稔，二人是紧密联系的。他提出的问题基于一种客观上与受访者一致的心态。即便有对象化倾向，那些最突兀的问题也不会带有威胁性或攻击性，因为受访者明白，采访者与之共享一种使他说出重要东西的心态；同样道理，双方也共享泄露可能导致的风险”<sup>②</sup>。因此被访者会对采访者有更强的信任，使采访变为“对话”而非强人所难的“问话”。

第二，“本就是他们”则更加悬置了研究者与附近发生关系联结的目的性，往往是研究者对自己正所处的“附近”的再审视。譬如徐前进《流动的丰盈》就以自己居住的小区为重点，试图记录那些不间断流动、不会进入历史档案的景观、人物和语言，比如家庭中的父代与子代、商贩与顾客的相互照应、环卫工的日常工作、退休遛狗老人之间的寒暄，以期将其纳入长时段的史学视野中。<sup>③</sup>再比如伊险峰和杨樱对自己社区周围的田字格区域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深描身边的茶叶店、服装店、小酒馆、菜市场等空间里“小人物”的个体故事，呈现出一幅上海社会网络、商业生态与城市文明的图景。<sup>④</sup>

除关注自己“正在”的附近外，“曾经”的附近也被学者们重新挖掘。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回归故里》，他在离开三十年后又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那个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他回溯自己的家族历史、童年时身处的工人阶级阶层以及成为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这看似是他个人和附近群体的互动与选择，但也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个“社会小世界”实际上呈现了“大社会”的运行逻辑和变迁轨迹。

例如，埃里蓬描绘了自己小时候每个周五晚上父亲到酒吧和朋友聚会、夜不归宿，回来后对着墙壁摔瓶子的场景：“他靠在房间的一端，抄起手边的瓶子（油瓶、奶瓶、酒瓶），一个个扔到对面的墙上摔个粉碎。我和哥哥蜷缩在母亲身边哭泣，母亲既愤怒又绝望地重复着‘好歹别伤着孩子’。”<sup>⑤</sup>在这个场景中，埃里蓬不再是一个自我审视的社会学家，而是万千工人家庭中蜷缩哭泣的普通孩子之一。作者紧接着否定了自己和读者用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来解释父亲日常行为的冲动，而是用工人阶级的社交方式和过早承担了家庭负担而无法享受青年生活的发泄来解释；甚至作者反思了这样的场景对自己幼年的工人阶级归属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扩展其社会学想象，把父亲与母亲、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孩子对比，完成了一次从附近日常生活到整体社会结构的连接。

相比“正在”的附近，“重回过去的附近”既能呈现一个丰满的关系空间，又能使学者通过时间的拉长切入历史的纵深处，不只沉溺于记录当下的故事而是对生命史进行反思。可以看到，当研究者将附近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天然的情感联结和关系展露会让读者模糊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在研究场景中的分离，研究对象不再是“他者的他者”，因而可以更好地激发读者对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小世界的共情。而研究者对自己附近的观察与思考，也给予了读者和研究对象一个进行自我反思的参考模板。

但同时，以“附近”为方法的研究也难免受到质疑。如上文案例所呈现的那样，研究者在选取案例时似乎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对研究对象追求深度而非数量的“深描”也体现出研究对象故事的“个人性”。但这一点与社会学学科的核心范式和研究旨向似乎出现了张力。因此，关注“附近的日常生活”就面临着回应“个人性”能否呈现乃至代表“社会性”的问题。

不妨以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日常研究为例。他对日常生活采用了一种印象主义式的叙事，最为典型的当数他对大都市中人们精神状态的描绘。他认为印象主义适合用来表达日常中的不连续性，而且也适合

① 徐宗阳：《内外有别：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② 皮埃尔·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41页。

③ 徐前进：《流动的丰盈：一个小区的日常景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

④ 伊险峰、杨樱：《九路口》，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

⑤ 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王献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63—64页。

于关注某些现代特有的经验形式，这也使日常的特殊性被迫显示出更为一般的社会力量。正如齐美尔所说，“独一无二的东西就强调了典型的的东西，偶然存在的东西显示为正常的东西，表面上的和飘逝着的东西代表了本质的和根本的东西”<sup>①</sup>。在齐美尔的笔下，身边稍纵即逝的日常是对社会生活各种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网络的回响，在个人性的“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都有可能发现它的意义的总体性”。<sup>②</sup>

布尔迪厄的研究兴趣和对个体故事的写作方式虽然与齐美尔大相径庭，但在这一根本的方法论上却所见略同。他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布尔迪厄在《世界的苦难》中用“短篇故事”式的个案研究所呈现的“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sup>③</sup>他明确指出这都是一些“私人话题”，比如他与住在“水仙街”上的一个法国工人家庭和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家庭的访谈，涉及的都是他们有关子女的教育、工作的日常以及他们对邻居的看法。通过这两个家庭的案例，布尔迪厄印象式地描绘了水仙街的现状、家庭内部的陈设以及邻居相处中最细微的日常情绪。整个篇章的分析看起来是琐碎的，访谈稿的内容也并不多，却生动地呈现出移民所遭受到的种族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失业、家庭的赤贫、与社区的格格不入、子女的学业受挫。事实上，这本书的所有篇章都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开始，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碎的有关痛苦的讲述，布尔迪厄试图引导读者看到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以此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二元对立。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普遍性与独特性间的对立，亦即法则性分析同有针对性的描述间的对立，乃是一种虚假的对立”，同时只有在特定的场域中才能揭示社会生活中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关系。<sup>④</sup>所谓特定场域，也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呈现研究对象完整的生活场景，而这一要求只有研究者位于研究对象的“附近”，才有可能更好去实现。

这也就意味着，“附近”不仅是一个关系场的空间，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根本的研究价值判断。结构是展露的，而个人生活是隐秘的，社会学研究不是把个体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去证明“社会”是什么，而是研究个体本身和相互之间的连接，挖掘结构之下个体的主体性，从中我们就能看到“社会”何以可能。换言之，我们应当通过分析特殊性之间的联系，而非通过归纳概括个案的共性得到普遍性。正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

社会学者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观点其实是针对某一观点的观点。要表达对象的观点，而且通过使之回归社会空间，实事求是地建构它，就必须以这个极个别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特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只有设身处地才能（从思想上）把握所有可能有的观点。社会学者虽然无法推卸地处在一个被社会指定的位置上，但只有将自身对象化，才能设身处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想（这个对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个自我）和采纳后者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此时才能够理解，假如处于他们的地位，自己无疑会跟他们一样，也会像他们那样思考。<sup>⑤</sup>

与布尔迪厄认为要从研究对象极其个例的观点出发，设身处地掌握“所有可能的观点”类似，费孝通晚年倡导的“文化自觉”也呼吁超越“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局限——社会学者要“去了解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的一部分，充满着有哭、有笑、有感情的举止言行，把文化拉回到人的生活本身，而不是把文化建立在奇谈怪论或者‘无知’的基础上”。<sup>⑥</sup>这意味着研究要从“我的生活”出发，囊括生活的整体性和“我”的主体性，同时也要格外关注“意会”的精神世界，关注作为“我”的人。<sup>⑦</sup>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要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压缩到日常生活空间，而是将主体纳入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个人的现象出发映照出社会整体的图景。

#### 四、超越作为方法的日常、附近与主体性

在社会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始终是不可忽视而又亟待重视的。研究者不应该局限于自己的身份立场和利益需要，要进行贴近普通人实际生活的深入考察。研究者应当正视研究对象作为“人”的主体性，

① Georg Simmel,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K. Peter Etkorn(tran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68, p. 69.

② Geor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om Bottomore and David Frisby(tran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55.

③⑤ 皮埃尔·布尔迪厄：《世界的苦难》，张祖建译，第1、1159页。

④ 转引自周晓虹：《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⑥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⑦ 参见刘亚秋：《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性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4期。

看到每个具体的普通人在结构性困境中的生活逻辑与日常行动。研究日常生活是呈现主体性的关键，关注附近是深入日常生活的前提。“日常生活”和“附近”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场域、一种写作和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学人本主义意涵上的一种价值判断。由此，研究者能够弥合琐碎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鸿沟，真正实现“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sup>①</sup>。

有趣的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出于对精英史观的反思，历史学家亦愈发重视历史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试图以一个北魏宫女——王钟儿的眼去看她所处的时代，把她周围的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看到他们面对权力时的不同情绪，透过一个宫女的人生故事中铺陈出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变迁和历史情境中的人物群像。<sup>②</sup>王笛对成都的社会史研究也强调从微观视角剖析大众文化，尤其关注成都民众在街头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以《街头文化》为例，他展示了改良和革命等政治运动对成都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呈现出现代化及现代性对街头大众文化的影响。<sup>③</sup>《茶馆》《袍哥》等著作也都体现出了类似的研究取向。在关注“附近的日常生活”这一研究取向上，社会学应当持续与历史学互鉴，注重从历史的维度拓深分析。<sup>④</sup>

在此意义上，尽管“附近的日常生活”总带有一种“空间”的联想，时间维度的考察同样重要。研究附近的日常生活必然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个人的生命历程，只有了解研究对象完整的生活历史，才能发掘个人主体性生成的微观机制，理解生活当下的状况因何而来，并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个人经历中找到关联。某种程度上，附近就是一部“社会小世界”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就是附近的时空里普通人故事的总和。社会学研究应当把关注“附近的日常生活”作为呈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切入点，这一价值判断印证着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意义，使之对社会的解释不再只是工具性的，而是拥有“解放”与“慈悲”的力量。

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关注“附近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呈现普通人主体性的唯一方法，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漫长历史看来，肯定也不会是最终、最优的方法。它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高估了普通人建构主体性能力的质疑，在研究实践中也一定会遇到种种在构思方法时无法预判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不断检验、反思和创新。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自觉与文化自觉”（2024THZWJC1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 Exploring Subjectivity: The Concept of “Nearby” as a Value Judgement

HUANG Siyi, YAN Fei

**Abstract:**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subjectivity is a critical concern with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Unfortunately, this aspect is frequently overlooked, obscured, or even distorted.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classical studies conducted on ordinary individuals within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contexts, delineating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ly conveying their subjectivity. Firstly, researchers should conscientiously examine the power dynamics inherent i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research subjects, recognizing and addressing any obscured aspects of subjectivity. Secondly, researchers should create spaces for autonomous expression for research subjects, present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everyday actions of ordinary people. Finally, researchers expand the concept of “nearby” in both the spati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through methods of “becoming them” and “already being them” in everyday life. This article underscores that “nearby” is not just a research field, but more importantly, a value judgment within the humanistic context of sociology. By reflecting on “nearby” cases, researchers collectively engage with the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reating research subjects as subject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Key words:** subjectivity, “nearby”, daily life, sociology

①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9页。

② 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③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④ 已有社会学学者做出了尝试，参见吴柳财：《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社会》2018年第1期；宋子昕：《塑造日常生活——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民沐浴观的嬗变为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5期。